

梁實秋
1901年生
北平人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研究
現專事寫作



關於魯迅

梁實秋著



傳記文學叢書之一〇三

傳記文學叢書之一〇三（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關於魯迅

定價新臺幣一百元

著者：梁 實 秋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 1—36 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11795921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三十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目 錄

關於魯迅·····	一
「五四」與文藝·····	一一
莎士比亞之謎·····	一九
莎士比亞的版本·····	三一
莎士比亞的思想·····	四九
「威尼斯商人」的意義·····	六七
孚斯塔夫的命運·····	七三
「李爾王」辯·····	八五

中國文學作品之英譯·····	一〇五
「沉思錄」譯序·····	一一五
怎樣讀「英國文學史」？·····	一二五
作文的三個階段·····	一三一
胡適之先生論詩·····	一三五
憶「新月」·····	一四三
重印「西澄閒話」序·····	一五七

關於魯迅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爲什麼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臺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爲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滢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滢先生和

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爲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自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週刊寫過一篇「魯迅與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看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複一遍我在那文裡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爲禁書。我生平最服膺服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双方的言論輯爲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裡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註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冊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報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燬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做爲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爲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

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爲職位低，二來因爲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誌寫一點雜感與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爲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置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爲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一吐爲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的洩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爲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柢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爲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爲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够的，他必需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麼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爲一個辦法。

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爲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褻貶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褻」是「褻」，「貶」是「貶」，如果做爲貶用，貶字之上即不能加褻，（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裡即曾把「褻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爲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爲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沒有關係，他是走頭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着這樣的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爲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

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却。這一文件的壽命並不太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蒲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學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Max Eastman: Artists in Uniform）。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者發生了軍事衝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桿上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顯明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裡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得很對。隨便寫過一點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着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里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裡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儘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裡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

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爲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裡，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爲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爲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爲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很是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爲對象，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爲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者即能成爲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尙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

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蕭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相在雜誌上刊出來，一邊站着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鬚髮銀白的蕭伯納，一邊站着的是身材弱小頭髮蓬鬆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史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週圍，自然要發洩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To see life steadily and see it whole)。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

Matthew Arnold 批評英國人巢塞 Chaucer 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發生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枝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五四」與文藝

五四運動發生在民國八年，那時候我十八歲。在當時我只是被那時代潮流挾以俱去的青年們之一。如今事隔垂四十年，我可以冷靜的回憶了。

五四運動原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後來轉變為新文化運動，新文藝是其中的一個部門。

新文藝運動是以白話文運動開端的。我們的文言與口語，相差過遠，這當然是亟需改革的一件事。胡適之先生及其他各位之倡導白話文，因為合時宜，所以迅速得到成功。至今無數人都在受益。胡先生是主張漸進改良的，他並不侈言「革命」，他在民國六年一月發表「文學改良獨議」，其中並無「革命」字樣。首先倡言「革命」者，是陳獨秀先生，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文學革命論」。胡先生緊跟着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加上「建設的」三字於「革命」之上，是

有深刻意義的。「革命」二字原是我們古代的一個政治術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引申其義，應用到其他激烈改革的事情上去，如不謹慎使用，可能流於誇大。就文學而論，自古至今，有其延續性，有所謂「傳統」，從各方面一點一滴的設法改進，是可行的，若說把舊有的文學一脚踢翻，另起爐竈，那是不可能的。即以文字改革而言，把文言與白話清楚的劃分開來便是一件很難的事。對於某些人，相當數量的文言已變成了他們日常應用的白話；對於另一些人，頗為簡易的白話可能還是和文言一樣的難解。胡適之先生寫「白話文學史」是有深長用意的，他的意思似是在指出白話文學並非是新的東西，它有它的歷史傳統，白話文運動只是那個良好傳統的延長。這樣解釋，白話文學運動便沒有多少「革命」的氣息了。可是在五四之後幾年，一般青年是喜聞革命的，是厭舊喜新的，所以對於白話文學運動中之嶄新的部份固樂於接受，而對於中國文學的傳統則過分的輕視了。其結果是近數十年來優秀文藝作品之貧乏。

文字是文學作品的工具。沒有優秀文藝作品的文字是不優秀的。在這一點上，文言與白話的道理是一樣的。白話而求其能適當的抒寫作者的思想情緒，則其白話便非我們日常應用的白話，必定是經過藝術安排後的白話。口裡說甚麼，筆下便寫甚麼，那不見得就能成為文藝作品。五四以後似乎是流行着一種誤解，以為凡是會說話的人就可以寫文章，寫出文章就可以成為文藝作品。文學的文字，是異於口頭的白話的，需具有藝術的安排與剪裁。五四以來的文藝作品，除少